

“弱势群体”的平等主义理论与 “真实世界”的政治哲学*

——J. 沃尔夫教授访谈

齐艳红

[编者按] 乔纳森·沃尔夫现为英国牛津大学布拉瓦尼克政府学院公共政策讲席教授、沃尔森学院治理体系研究员,研究领域为政治哲学,特别是社会平等与“真实世界”的政治哲学。其早期著作包括《弱势群体》(与迪夏利特合作)、《政治哲学导论》《当今为什么还要研读马克思》《罗伯特·诺奇克》等;近期研究主要涉及平等、弱势群体、社会正义和贫困等理论问题,集中体现在他的著作《伦理学与公共政策:一种哲学探究》和《人的健康权》之中。2018年6月,笔者在牛津大学围绕当代平等主义政治哲学这一主题对沃尔夫教授进行了专访。访谈从讨论当代平等主义关于“什么的平等”问题的争论入手,区分了分配平等与社会平等两种思考平等问题的路径,并对当代各种版本的分配平等理论的局限进行了评估,进而转向马克思哲学的当代阐释问题,探讨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走向衰落的理论和实践根源,揭示出当代平等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内在相关性”。最后,针对当代平等主义从理论出发将理论直接应用于实践的“理想理论”的缺陷,提出从真实世界的问题出发的“参与式”政治哲学理论。

一、社会平等与“弱势群体优先”

齐艳红: 作为一位知名的政治哲学家,您在过去10年里最重要的一个研究领域就是社会平等与正义。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和研究社会平等与社会正义问题的?理论和实践的激励因素是什么?

沃尔夫: 受家庭环境特别是我母亲的影响,我在上学之前就对“一般的平等和正义”问题产生了

兴趣。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也是受到兴趣的激发,我围绕剥削议题做过大量研究。到目前为止,我对这些主题的研究兴趣已经持续了40年之久。但是,我对“社会平等”问题的关注大概始于20年前,也正是从那时起,我跟随科恩教授学习并进入了该领域。当时他极为重视德沃金和罗尔斯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1世纪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项目编号:18BZX03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的分配正义理论,尤其对德沃金的理论感兴趣。德沃金和罗尔斯都认为,正义就是一个决定如何分配社会资源以便使人们在某种意义上得到平等对待的问题。对此,我一直持怀疑态度。我不认为平等问题主要是资源分配的问题。在我看来,平等问题的核心是人们之间的平等关系理念,而非物品的平等分配理念。因此,分配平等与社会平等是两种不同的考量平等问题的路径。当然,我赞同科恩、德沃金以及罗尔斯等人的观点,认为不能忽视分配平等,但是我认为“社会平等是一种怎样的平等”才是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20年前,我在一篇论文中提出,如果一个社会过于注重物质平等,就不得不反复核查人们实际拥有的一切,以确保他们得到真正所需。这将会导致一种“审计”社会,人们在其中会产生不被信任的感觉,从而失去自尊。

具体而言,无论是德沃金还是科恩的理论,都体现了一种非常清晰的公正观念。根据他们的观点,“人们为之负责”与“人们不必为之负责”的事情之间是有区别的,人们必须在“选择”与“运气”之间做出区分。如果一个人的生活状况变差是自己自由选择的结果,那么他寻求社会帮助的要求就是不正义的;但是如果一个人的生活状况变差完全是由超出自己控制的境况造成的,那么这个人从国家获得帮助的要求就是正当的。这就是众所周知的“运气平等主义”理论。从一定意义上看,运气平等主义是公正的,但是如果把它们付诸实践,按照这种模式组织社会,困难就会出现。假设一个人失业了,想要向政府寻求补偿,政府就必须调查这个人失业到底是因为他的个人选择,还是因为坏的境况或者坏运气,这就意味着,政府必须要弄清楚他找不到工作是由于他缺乏工作能力还是太懒而选择不工作,如果是后一种情况,这个人就没有资格拿到补偿。一旦政府开始调查,就显示出对人们的不信任,从而会伤害人的自尊。这样一来,运气平等主义就回到了一种已经过时的观点,即在“应得的贫穷”与“不应得的贫穷”之间做出区分。这种观点认为,一个寡妇或者孤儿的贫穷是应得的;但是对于一个健康强壮的人来说,就应该自己去工作赚钱。那么,如果你看起来既健康又强壮,但是实际上却因为某种原因而无法工作时,你就需要向政府证明这一原因。而

做出这种证明是非常困难的,也可能是耻辱和压抑的。我认为,平等主义的社会不应该迫使人们为了得到补偿而公开他们因偶然因素而形成的弱点。如果尝试把德沃金和科恩的理论付诸实践,它不仅帮助不了那些他们本来想要帮助的人,而且还会对大多数脆弱的人们造成伤害。

齐艳红:这就是说,您的“社会平等”理论研究开始于对“运气平等主义”的反思和批判。实际上,在分配正义领域,围绕“什么的平等”这一主题存在着广泛的争议,除了罗尔斯、德沃金和科恩以外,许多理论家都提出了不同理论。我注意到您在《弱势群体》一书中提出了一种“优先考虑弱势群体”的平等主义理论,这种理论希望为社会政策的制定者们提供指导。那么,您的平等主义理论是如何回应上述论争的?就讨论“弱势群体”而非“平等”而言,您的理论在何种程度上不同于其他理论?

沃尔夫:有两点至关重要。首先,在支持平等理念的理论家之间的确存在上述争议,不同的理论家提供了不同的方法。例如,有像科恩那样相信“分配平等”的理论家,也有像法兰克福那样主张“充足性”的理论家;有像罗尔斯那样提出弱势群体的“绝对优先性”的理论家,也有像帕菲特那样坚持赋予弱势群体“有限优先性”的理论家。在《弱势群体》一书中,迪夏利特和我都认为,无论你相信哪一种理论,政策都是一样的,至少在短期内如此。政策的目的是找出那些处于最不利境况的人,并采取相应措施去改善他们的生活。因此,从实践上说,这并不是一个重要的争论。实际上,我们在本书中表达的并非一种理论争论,而是要在理论争论成为一种实践争论之前推动社会政策取得重大进展。所以我们的方法是务实的,只处理那些需要我们解答的问题。

其次,科恩提出的“平等主义正义的通货”问题实际上是关于如何识别福祉的争论。我们认为,不能用偏好的满足或个人的福利去决定福祉,也不能用资源去衡量福祉。福祉在本质上是多元的,因为福祉包括许多方面,并且其中某个方面的缺失不能通过其他方面的补偿来平衡。比如说,如果一个人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那么即使给他一所更好的房子,也不能弥补他在教育方面的

损失,因为问题在于这个人应该得到更好的教育;如果一个人正在遭受暴力,那么就on应该立即停止暴力,而不是仅仅从经济上补偿他。我们强调,福祉是由许多不可相互还原的东西组成的,然而许多现存的理论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如德沃金的理论是一元论的,他提议我们聚焦于资源,在他那里,资源指的仅仅是货币;罗尔斯的理论更复杂一些,涉及自由、机会、收入和财富、自尊等,但是他并没有论及健康和残障问题,他的理论也是狭隘的。我们更赞同阿马蒂亚·森的能力理论,因为它是一种多元论。尽管《弱势群体》一书中的平等主义理论更接近于努斯鲍姆的能力理论,但是森的理论确实是我们研究的出发点。我们超越森和努斯鲍姆的主要贡献在于,我们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给予了很多关注。我们认为,如果一个人的未来缺乏某种确定性,那么仅具有执行某种功能的能力是不够的,因为今天拥有的东西,可能明天就会失去,所以风险和脆弱性也需要被考虑在内。对比以下二人可以清楚地理解这一点:一个人的工作稳定有编制,另一个人是临时工,即便他们有着相同的收入,后者相比前者境况更差。这显然是大多数人都会接受的理念。

从我们的视角看,科恩的“优势可及平等”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比德沃金的理论更合理。德沃金的理论将福祉诉诸“资源”,而科恩却运用了“优势”观念,该观念既包括资源又包括福利,因此科恩的理论更加多元化。但是,科恩的理论也存在局限,即在坚持“优势的平等可及性”的同时并没有清楚地表明如何对资源和福利进行权衡。这样一来,当我们考虑构成福祉的诸多因素时,似乎就会面临更大的问题。但是,由于我们提倡“赋予弱势群体以优先性”而不是提倡“平等”,所以我们的任务与科恩不同。我们的任务是找出分配中的弱势群体,并且我们相信即便根据福祉的多元主义观点,在社会中就“哪些人是弱势群体”也可以达成广泛的共识。由此,我们的立场优越于科恩的立场。此外,科恩的理论还含有运气平等主义元素,这个问题我们刚才讨论过了,这也是我认为科恩的观点有局限性的原因。

齐艳红:与上述问题相关,我想更多地了解一下您对于当代平等主义理论在分配平等或分配正

义争论上的看法。在您看来,当代平等主义政治哲学争论的主要局限是什么?您认为,什么类型的平等主义理论能够有效地促进您所在社会的平等和正义?

沃尔夫:在过去的10多年里,我力图阐发的一个观点就是,拥有一种肯定性的社会平等理论是不太可能的,所以要想说清楚社会平等的主要内容也比较困难。我相信社会平等的方式是多样的,因而我所做的就是把问题颠倒过来,不去关注“平等”,而是聚焦于“社会的不平等”。“社会不平等”的主要表现是很清楚的,比如说歧视、剥削、支配、谄上欺下等诸多不平等的关系,从社会平等的视角看都是很恶劣的。我的课题是识别出社会中的各种不平等关系并设法去克服它们。在我看来,人们应该更多地关注不平等现象,去限制和减少不平等现象,而不是仅仅构建一种“理想的”平等理论。

当代的许多平等主义理论都非常关注分配和再分配问题,从而认可税收和转移政策。对此,我并不反对。但是我认为,我们同时应该关注那些被削减了的公共服务的供给。当前在英国,低收入人群从国家那里获得住房变得越来越困难了;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去接受教育;社会服务大打折扣,甚至图书馆和博物馆也减少了很多。在这种情形下,我想说,平等主义的任务是支持公共服务的供给和发展。目前我尝试推进的一个根本性观点就是在“经济上成功的生活”与“美好的生活”之间做出区分。我们的社会应该确保其中的每个人都能够拥有美好的生活,即使在经济上不算成功。这意味着要向人们提供大量公共服务和设施,如博物馆、图书馆、公园、免费的医疗、公共住房等。当然并不是说低收入人群得到更多的经济补偿不重要,而是要记住“市场不是一切”。在目前的英国,市场正变得无比重要甚至过于重要,所以我们需要确保人们能够获得一些超出市场控制的东西。这不是在意识形态上反对市场,而是强调国家供给和市场供给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大概在30—40年前,那些低收入人群还有一些获得价格相对低廉的国家保障住房的机会,但是现在这样的机会越来越少了。因此,我认为那种更多关注“公共服务和统一供给”的政治哲学能够有效促进社会的平等和正义。

二、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平等主义理论

齐艳红: 我们知道, 科恩教授不仅因其为社会主义平等主义辩护而被誉为“平等主义的良心”, 而且还是 20 世纪 70 年代兴起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领军人物之一。关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伊斯特兰德的分析令人印象深刻。他在论述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英语世界的政治哲学中所起的作用时指出, 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传统, 特别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线索, 在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消失了”。就像有人为的那样, 部分原因可以归结为“柏林墙的倒塌和苏联的解体”, 但是这是一个“令人感到困惑的问题”。伴随着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消失, 平等主义理论却活跃起来, 由此出现了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到“平等主义原则”的研究转向, 这不仅体现在术语方面, 而且体现在核心概念和理论层面。^① 我想知道, 作为科恩教授的弟子, 您是怎样看待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演进的?

沃尔夫: 我认为, 除了柏林墙的倒塌以外, 还有两个主要原因使得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衰退了。第一, 这是理论发展的结果。我主要参考的是科恩对马克思历史理论的阐释和罗默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 他们都认为, 运用现代理论能够更好地阐释马克思的观点。科恩和罗默分别运用分析哲学方法和最新的经济理论建构了精致的理论, 并获得了广泛的关注, 其中包括许多重要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于是他们尝试对这些批评进行回应。虽然他们的理论辩护已经尽力了, 但是其理论仍旧被匈牙利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称为“退步性的研究纲领”。拉卡托斯认为, 一个富有活力的研究纲领在被广泛地运用于现实时, 能够越来越很好地解释世界, 如“重力理论”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理论, 因为它能解释许多不同的现象。而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则相反, 它不是用理论去解释更多的新事物, 而是理论本身面临越来越多的新困难, 这个时候就需要改变理论以适应世界。在某种程度上, 这对于任何理论来说都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过于频繁地更改理论, 理论就容易出现问題, 最终导致退化甚至解体。这就是科恩和罗默所面临的理论困

境, 因而经过大约 10 年时间, 他们转向了政治哲学。

第二, 在实践方面, 社会就像诺夫在《可行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发展着。诺夫是苏联经济史学家, 曾是一名共产党员。我认为他对马克思的思想是非常同情和支持的。他关于苏联经济史的研究备受赞誉, 后来又写作了《可行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他在该书论证道, 我们现在缺乏一种可行的、完全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他认为, 如果不是因为“非法”市场存在的话, 苏联的社会主义早就解体了。我想这本书会让许多左翼人士感到震惊。我读过这本书, 因为我希望有人最终设计出一种恰当的社会主义经济。诺夫认为, 如果没有了市场, 那么社会主义经济在事实上是不可能发展的。总之, 在退步性的研究纲领以及认识到缺乏可行的社会主义模式这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很难再有吸引力。

齐艳红: 考虑到上述问题, 您是否认为在当今的平等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传统之间具有一种内在的关联?

沃尔夫: 我认为有的。当今的平等主义理论确实受到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激励和影响, 但是我并不因此认为, 人们现在构想的观念是独特的“马克思主义的”。目前在英国很难说清楚作为一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意味着什么。或许那些为主要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公共所有权”作辩护的人最接近上述称谓。虽然目前工党的一部分成员比我们更加支持公共所有权, 但是我不认为所有人都相信全盘计划经济, 甚至马克思本人是否认为我们能够拥有全盘计划经济这一点也是不清楚的。

齐艳红: 谈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还涉及一个非常重要的规范性问题。在 20 世纪 80 年代, 英语世界的许多理论家都参与到对马克思理论的阐释当中, 特别是围绕“马克思与正义”问题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论断。非常典型的例如伍德认

^① David Estlund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Introduction.

为,马克思似乎认为资本主义剥削是正义的。您是否同意伍德的阐释?您认为马克思有正义理论吗?

沃尔夫:伍德的阐释是非常精致的,无疑对“马克思与正义”问题的相关争论作出了重要贡献。按照他的观点,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是正义的,因为正义概念总是与一种经济制度相对应,不存在超出这一视角的其他运用。我认为,伍德的论证体现了他对马克思的理解。马克思不承认自己有正义理论和道德理论,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剥削具有历史的必要性,因为没有剥削,资本主义就无法存续,而不经历资本主义的发展,共产主义就不会到来,因此他才得出剥削是历史的和必要的结论。但是,就此得出“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是正义的”结论则是有悖常理的。虽然马克思确实说过资本主义剥削“并非不正义”,但这是否就意味着他认为资本主义剥削是正义的?另一个说法是,马克思认为正义不是一个有用的概念。又或许马克思只是想提醒我们,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剥削在法律上是可以被接受的。此外还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当马克思写作的时候,他只是想让我们印象更深刻,因为马克思并不是以哲学家的身份来写作的。从其著作本身来看,马克思是一个作家,他运用了夸张、讽刺、反语等手法,仅仅解读其字面含义,引用他的话,很难理解马克思的真正意图,有时候马克思看起来是在进行诗歌创作或者文学创作。

尽管伍德的阐释非常重要,但我更倾向于支持科恩的阐释。科恩说“马克思确实具有一种正义理论,但是他并不认为他有一种正义理论。”这意味着,马克思有正义理论,但是他并没有意识到。从马克思的早期著作来看,他正是基于正义感而写作的,如果他根本不相信正义或不正义,那么他的许多断言就是没有意义的。但是我认为,马克思确实对哲学争论感到沮丧,对他来说,不同的人持有不同的看法,哲学论证永远难有结论。因此,他认为所有的意识形态都可能变得扭曲,由此他想抛弃所有关于正义的话语。然而,自相矛盾的是,他放弃谈论正义乃正是因为他具有一种正义感并且想要改变世界,一方面说要改变世界,但另一方面却说不相信新社会比旧社会更好,这没有任何意义。从这个意义上看,马克思当然持

有一种道德观点,即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在道德上是更优的。但是从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来看,他又认为不需要道德论证,因为历史会朝着那个方向发展,所以他没有进行道德论证,而是转到经济学和历史分析中进行论争、赢得论证。

就科恩本人来说,他认为,如果不再相信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就需要把道德论证找回来,除非马克思关于历史的说明是真实的。但是科恩不知道历史理论是否真实,所以他才返回政治哲学。

齐艳红:这样看来,马克思是有正义理论的,只不过是有一种特殊的方式表达出来的。您在《当今为什么还要研读马克思?》中,对马克思的早期著作进行了阐释和评估,比如您讨论了《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对自由主义平等权利的看法,也阐述了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著名的“能力—需要”命题,但是您并没有从政治哲学的角度进行说明。您认为马克思有政治哲学理论吗?马克思的“需要”能否成为一个分配正义原则?

沃尔夫: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马克思虽然否认有自己的政治哲学,但是很容易建构一种可以被称之为“马克思理论”的政治哲学。能力—需要命题是进行此类建构的一个很好的出发点,它是一种非常令人鼓舞的正义社会观念,“需要”可以成为一个分配原则,但是它自身还是一个极为模糊的观念。但是我认为,它非常接近于森和努斯鲍姆所发展的能力观点。努斯鲍姆说过,她在阐述自己能力观点时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在英国,“马克思主义者”意味着相信所有诸如劳动价值论和通过无产阶级革命使资本主义崩溃之类的马克思的主要观念,尽管这种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还存在,但却非常罕见。但是,如果问题变成“你是否从马克思那里获得了灵感或启发”,那么几乎所有的平等主义者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们大都受到了马克思的某种思想——或能力—需要原则或资本主义批判或其他思想——的影响。罗尔斯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了马克思的一些观念的影响,但是几乎所有的平等主义者都不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当然也包括我。那些意图削减大企业权力或者致力于限制市场范围或者关心工作条件和剥削的自由主义的平等主义者无不受到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影响。

当然不能否认,许多观念在马克思之前就存在了,但是它们通常被等同于马克思的观念,因而许多深受马克思思想影响的理论家也不会把自己称为马克思主义者。努斯鲍姆就是一个例证。简言之,构建一种受马克思激发的政治哲学是很容易的,但它却不是马克思本人的理论。

三、从真实问题出发,做 “参与式”政治哲学

齐艳红:近些年来,您通过把哲学与公共政策相结合,致力于建构一种有助于指导社会公共政策的政治哲学。这是否意味着您的思想的一次转折?根据您的研究,理想理论与平等主义政治哲学的关系是怎样的?

沃尔夫:是的,可以说是一个大的转折。我说过,我接受的专业教育是科恩和其他一些政治哲学家所讲授的哲学,这些政治哲学家们认为他们的任务就是构想出社会的正义理论。如果哲学家想影响政治家,就要让政策制定者相信哲学家的观点是对的,然后依据哲学家的理论去改变世界。也就是说,由平等主义者们论证出最好的平等理论,其他人则朝着哲学家建构的平等观念的方向去改变世界。这些都是我潜在接受的观点。但是后来我意识到,由于理论与真实世界之间存在着巨大鸿沟,政治哲学的这种研究方式并不会带来什么助益,如何跨过这个鸿沟仍然是不清楚的。以罗尔斯的理论为例,假设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完全信服罗尔斯的理论,接下来会怎样?实际上,罗尔斯的理论不会为国家可能面临的任何实践问题提供指导。例如,真实社会在某些方面仍然存在着性别、种族、性取向的歧视等问题,然而在罗尔斯假定的社会里,这些都不存在;罗尔斯的理论主要聚焦于理想的正义理论,他不会为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提供具体的政策建议。再比如,很少有主流的平等主义者探讨贫困问题,因为在正义的社会中不存在贫困,这些问题被留给了其他人。似乎哲学家的任务就是创建宏大的理论,其他人的任务则是推动世界的变革。这显然是一种哲学家的“自大”。

对我来说,这种态度的转变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现在我认为,应该从真实世界的问题出发进

行具体的研究,比如我对残障问题的关注就是这种研究的开始。罗尔斯几乎没有谈论过残障问题,但是残疾人在生活中面临着巨大困难,在许多地方他们都没有得到平等对待。显然这是正义和平等的一个重要难题。就像德沃金一样,通过研究残疾人问题而推导出一种正义理论是可能的,然而,德沃金并没有对残疾人的具体生活以及他们面临的社会难题等进行研究,导致德沃金的理论很难被残疾人激进分子关注。我的方法是从实践出发理解社会中的不平等,并思考哲学家在设计解决不正义的方案过程中的身份定位。我目前关注的是理解世界的非正义和非平等,探索如何运用我们的集体想象力为那些正在遭遇不平等和非正义的人们解决问题。所以,我本人的确经历了从理想理论到我称之为真实世界的政治哲学的“转向”,后者是关于哲学家能够为解决正义和平等问题做什么、贡献什么的思考。

这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理想理论,我们需要理想理论并因此需要人们去研究理想理论,但是我们不需要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研究理想理论。理想理论有助于我们的思考,所以它能够促进真实世界的政治哲学。当然,理想理论就其内在而言也具有重要性,即便它不能为实践提供帮助,它对于人们思考正义问题仍然具有重要性。即便到现在,我的一些研究也是建立在理想理论基础之上的,但是我认为研究真实世界的政治哲学是更有意义的。相比之下,研究真实世界的政治哲学是困难的,因为学界更倾向于激励大家研究理想理论,因为抽象的思考能够得到回报。我们甚至缺乏研究真实世界的政治哲学的动力。人们似乎认为研究真实世界的政治哲学是容易的,因为它是经验的,但事实并非如此。你需要了解不同的学科,需要阅读不同的材料,需要与兴趣各异的人们进行交流,这些对哲学家们来说并不简单。基础理论与实践可以是互补的,但是在我看来,“先构想出理想理论然后把它转化到真实世界”是有问题的。理想理论虽然可以给人们带来启发,但却不能被直接应用于实践。

齐艳红:在《伦理学与公共政策》一书中,您在引用马克思墓碑上的话“哲学家们总是以各种方式阐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时指出,当今

时代不乏希望改变世界的哲学家,但缺乏阐释世界的哲学家。在您的论证中,您也反复强调“从哪里出发”的重要性。这意味着,您本人的政治哲学是一种“理解世界”的政治哲学。那么,您的观念会违背当代主流的平等主义政治哲学吗?

沃尔夫: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方法,许多哲学家已经在研究被我称之为“参与式”的政治哲学了。他们寻找世界中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建议。他们会运用在他们看来有助益的理论,而不是一直运用功利主义、罗尔斯主义或康德主义之类的单一理论解决一切问题,不是通过单一的概念框架看待一切。“应用的”政治哲学总是把理论作为出发点,寻求理论在世界中的直接应用;而“参与式”政治哲学则是把真实世界中的问题作为出发点,运用各种理论和概念去思考它、解决它。举例来说,在思考特殊的歧视或剥削问题时,“参与的”哲学家首先尝试理解具体的经验问题,然后明确可用的理论或价值。我引用马克思墓碑上的话想要说明,在试图改变世界之前,先去理解世界。

齐艳红:这样说来,“从哪里出发”实际上意指“参与式”政治哲学倡导从社会现实出发。但是,如果政治哲学家们想要构建一种关于真实世界的理论,那么这种理论会因为贴近社会和实践,从而陷入“非批判性”吗?

沃尔夫:确实存在着这样的危险,哲学可能会变成“非批判性的”。这也是为什么一些人认为我们需要理想理论的原因,理想理论可以为解决分歧提供一种外在的批判立场。假设自由与平等之间存在冲突,有人认为自由更重要,有人认为平等更重要,人们就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有些人因此认为理论的存在就是为了解决争议。实际上,在同一个理想理论层面上达成一致的情况与在实践层面上不一致的情况都是极为罕见的。如果只是把相同的问题放置到另一个层面上理解,即使是理想理论也可能变成非批判性的。我建议,在相同的理论上达不成一致意见时,最好先讨论一下问题的情境,而不是上升到抽象层面。在我看来,不是每一个问题都能得到解决,因而我们经常要做的就是寻求妥协。问题会反复出现,许多哲学家特别是那些理想的理论家们,试图一劳永逸地给出所有问题的答案,他们想要成为最终的政治

哲学家。虽然我理解那种想要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的冲动,但这是不可能的。

齐艳红:我个人觉得您从事的平等主义政治哲学研究蕴含着某种关于如何研究政治哲学的思考,相对于那种脱离人们的真实生活的抽象理论研究,您能提供一些关于如何研究真实世界或者参与式政治哲学的建议吗?

沃尔夫:首先,这不是适用于每个人的普遍指南。有些人应该继续研究理想理论,他们通过阅读最新的资料,思考其他人的成果,然后形成自己的观点。但是如果从事参与式政治哲学,就需要从阅读报纸和了解社会运动开始。举例来说,现在关于性别特别是性侵犯和变性权利有许多讨论和争议,对于政治哲学家来说,这是非常困难的领域,因为这些问题太敏感。但是对于那些准备介入这项工作并愿意冒险的人来说,尝试理解其中的论证并弄清楚人们如何遭遇了不正义则是可能的。作为政治哲学家,应该去探索一个领域,考察其复杂性和利益,阻止不正义或伤害的发生。目前我正在研究有关贫困的课题,我想要弄清楚何为贫困,它是如何产生的,怎样的社会政策才能够改善贫困等。对此,许多人担心甚至怀疑,这不属于哲学研究范畴。但是我认为,是否从事哲学研究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从正义和平等的立场看待社会问题并进行研究。

(齐艳红:南开大学哲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张甲秀)